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8

《史记》

韩兆琦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6
8



学术顾问

季羨林

钟敬文

启功

程千帆

丛书策划

侯忠义

杨爱群

特邀编审
(按姓氏笔画)

宋加哲

张俊

张国星

林辰

侯忠义

欧阳健

高翔

董文成

傅憎享

薛勤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8]

《史记》

韩兆琦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韩兆琦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1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ISBN 7-5313-1927-6

I. 史… II. 韩… III. ①中国—古代史—纪传体—史籍—评论②史记—评论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3687 号

《史 记》

韩兆琦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57 千字 印张: 3 1/8 插页: 2

印数: 1—8,000 册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爱群

王维良

王 颖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封面设计: 杜凤宝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1927-6/I·1671

本册定价: 6.00 元 总定价 (全 100 册): 600.00 元

目 录

- 一、司马迁其人与《史记》其书/1
- 二、《史记》呈现的进步民族观点/27
- 三、《史记》展示的先进经济思想/38
- 四、《史记》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50
- 五、《史记》感人的生死观与价值观/66
- 六、《史记》的写人艺术/77
- 七、《史记》对我国传记文学与小说的影响/95

一、司马迁其人与《史记》其书

一个时代同时出现两个极其伟大的人物，一个在政治上，一个在文化上，其建树同时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都在自己的领域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这种事情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少见，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少见的，而司马迁与汉武帝就正是这样同时出现的既相克相残又相辅相成的两个极其伟大的人物。汉武帝生于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0年即位，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87年去世。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比汉武帝小十一岁；死于公元前90年，又比汉武帝早死了三年，但从大体上说，司马迁正好与汉武帝相始终，是中国历史上同时出现的一对双子星座。司马迁具体所生活的是怎样一种时代与家庭环境，这种时代与家庭环境对于司马迁思想性格的形成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这几个问题。

（一）司马迁的时代

早在刘邦建国的时候，由于秦末连年战争，生

《史记》

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民破产流亡,社会经济凋敝,严重的程度以至于达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的上下普遍穷困的状况。但刘邦建国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注意稳定社会秩序,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的相继努力,使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到武帝初年,经济的繁荣已经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司马迁概括这时的经济形势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同上)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汉政权的巩固,而且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政治上,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同姓王的措施,使封建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达到极盛。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创立于秦始皇,但那时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汉高祖刘邦重建帝国,在断然消灭了异姓王的同时,又接受“秦孤立而亡”的教训,大量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想借此达到藩屏汉室、巩固统治的目的。可是事与愿违,由于这些同姓诸侯王的辖地过多,又可以自置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可以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己管理军队,仍然处于半

独立状态,所以形成了一种干弱枝强的局面。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些大诸侯王国的势力也迅速膨胀,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日益严重,终于在景帝时代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朝廷改定制度,改变王国官制及其职权,规定诸侯王只征收租税,不管政事,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的力量显著加强。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又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恩”把国土分给子弟为列侯。按照汉制,侯国是隶属于郡的,地位相当于县,这事实上就把诸侯王的土地逐渐变成了朝廷直辖的土地。“推恩”诏下后,王国纷纷请求分封子弟,一些大的王国很快就变成了众多的小侯国,再也没有力量与中央政权对抗了,西汉王朝终于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在削平诸侯割据势力的同时,各种政治制度、等级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完备起来,封建的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凭借汉初数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他在位的五十多年中,充分发挥他的雄才大略,不但对内多所建树,而且对外连年用兵,伐匈奴,征闽越,通西南夷,征朝鲜,并用兵西域,大大扩展了西汉王朝的版图。这对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能把视野扩展到大宛、朝鲜、匈奴、闽越、西南夷等边远地区,首创国内各民族地位平等,树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概念,具备了客观条件。同时,统一的国家,辽阔的疆域,四通八达的道路,使司马迁有可能畅行无阻地游历全

国，考察地理形势，了解风俗民情，搜集逸闻轶事，而这一切对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帮助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为了保证汉武帝这一套政治、经济、军事路线的贯彻，汉代初期所奉行的那种“清静无为”的黄老哲学当然就显得极其过时了，于是汉武帝便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里，汉武帝所尊的“儒”，其实既不是孔子的“儒”，也不是孟子的“儒”，而乃是一种以儒家为基础，同时吸收了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等各家各派观点的一个综合体。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用儒家的外衣，用儒家的词语来“缘饰”、来装点他的独裁统治。例如，汉武帝要实行任何一项政策，儒生们就要引出儒家经典来证明它的合理性；又如，他们为了提高各级办事机构的儒学水平，于是便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长官都给配上儒生当助手；当时皇帝的诏令和各级官员的上下文书，都必须引经据典，文词雅丽。“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儒林列传》）。对于汉武帝的这种做法，后人简便地称它作“外儒内法”，汉代统治者自己则称它作“杂霸而治”。事实上统治者光用儒家的一套“仁义”高调，或者光用法家的一套残暴镇压，都是不能取得长期效果的，这从先秦以及秦朝的教训中已经看得很清楚。汉武帝正是吸取了前人失败的教训，才选用了这种残暴镇压与精神麻醉相结合的双管齐下。对于统治者来说，这

么做无疑是成功的。汉武帝的这套做法，基本上被后代历朝的统治者们沿袭使用了两千年。

武帝时期文化学术方面的成就也是激动人心的，他在其父祖所实行的“废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的基础上，又“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于是“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在著述方面，这个时期在建国以来“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的基础上，淮南王刘安纠集门下学者编辑了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采阴阳、道、法诸家写出了《春秋繁露》；司马谈以道家为基础，全面总结先秦诸子，写出了高屋建瓴、“有偏重而无偏废”的《论六家要旨》；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更是牢笼百代，前无古人。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包容了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医学、天文学等集先秦、汉初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书。刘勰曾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概括这个时期的文学成就说：“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

以上所说的是武帝时期强大、宏放、蓬勃发展

的一面,这是造成当时上人们积极人世、勇于进取并充满自信心、自豪感的历史条件。是强大的国威与灿烂辉煌的文化前景激起了人们的事业心,并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事业一定能完成,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君子鄙没世而名不称”这句孔子的老话在当时竟也成了一条品评人物的至高准则。“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踢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跖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是汉武帝的一封求贤诏。看,它有多么活泼,多么开放,没有一点框框,没有一点顾忌,真是宏阔之极,豪迈之极。司马迁曾对人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这种性格、这种口气上的矜夸与自负,实在是当时那种时代精神的充分体现。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以及他后来忍辱发愤的动力在相当程度上是来源于这种豪迈的时代因素。

但是汉武帝时代的整个形势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为了保证对外战争与其整个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的需要,他在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旨在搜刮、掠夺的政策,诸如算缗、告缗、平准、均输、盐铁官营等等,朝令夕改,弄得民不聊生。在政治上实行酷法严断,他们“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

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滑犯法，酷吏击断，转相比况，禁网浸密。”（《汉书·刑法志》）当时甚至有所谓“腹诽”之法，其名目之新奇，似乎连被他们称之为“暴秦”的时代都没有听说过。其实行的结果是使朝野上下，重足一迹，噤若寒蝉。在文化、思想上，汉武帝口头上鼓吹“尊儒”，实际执行的却是一套严刑峻法。这种“外儒内法”的专制统治，完全压制、扼杀了西汉初期那种生动活泼的思想文化局面。从此整个社会风气都为之一变：过去君臣间那种比较平等、敢于推心置腹的关系不见了，变成了唯唯诺诺、你发令我服从的主子与奴才；在社会上过去那种敢于伸张正义、敢于反抗邪恶、敢于打抱不平的风气不见了，变成为循规蹈矩、胆小怕事，甚至趋炎附势、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在思想学术上过去那种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追求真理、无所忌讳的风气不见了，变成为一切紧跟官方舆论，一切都要看着皇帝、看着权贵的脸色行事，一切学术、一切文章都成了给皇帝歌功颂德，都成了给皇帝的一切行为、一切举措作解释、作辩护的东西。在这种形势下，不论是朝廷大臣，还是思想家、文学家，必然都要选择自己的立场，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自己的态度。这样我们也就很容易地明白了为什么在武帝时期会产生那么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的辞赋，也可以很自然地明白了深受战国以及汉初思想文化影响的司马迁为什么会在《史记》中表现出了那么多的与汉代统

治者们的不合拍，以及有那么多民主性与批判性。

(二)司马迁的家世

关于司马迁的家世，现存资料甚少，惟一的是他在《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追述，他说：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在这段叙述中,有几个问题值得重视:第一,司马迁把自己的祖先远溯到传说中的颛顼时代,他说他们家是从重、黎时代传下来的,他以自己出身在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世代史官家庭中而自豪。因为他家祖先曾世代代为史官,所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也都非常乐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担任史官,而害怕这种传统在他们手里中断。同时,这种世代为史官的家世,还为司马迁积累了丰富的修史知识和经验,培养了司马迁优良的史学品德。这种优良的品德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以修史为己任,在兴旺发达的汉武帝时代义不容辞地自觉承担起了述史的任务;二是继承了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像齐太史兄弟和晋太史董狐那种威武不能屈、敢于同强权作斗争的反抗精神,以及他们宁死也要直书的强烈的正义感。司马迁后来惨遭酷刑后,还能“隐忍苟活”,发愤著书,就与此密切相关。

第二,在司马迁的祖先中,司马错等人作为司马氏家族中杰出的军事人才,对司马迁掌握军事知识和其战争观的形成,具有一定关系。司马迁的直系祖先是秦国司马氏,八世祖司马错是秦国的著名大将,历事秦惠王、武王、昭王三朝,前后三十六年。据《秦本纪》、《六国年表》、《张仪传》、《白起传》等篇记载,司马错七次出征,为秦西取巴蜀,南夺楚黔中地,东伐魏,拓境过安邑,使秦国土地扩大了两倍。司马错之孙,即司马迁的六世祖司

马靳是秦国名将白起的得力助手，在长平之战中为秦军副将。长平战后，秦军分为三路攻赵。白起自率一军定上党。王龁率一军取赵皮牢。司马靳率一军北定太原。公元前 257 年，白起不肯为将攻赵邯郸，被秦昭王赐死，司马靳连坐而死。白起不肯为将，是因为他认为攻围邯郸不能取胜，他宁死也不做败军之将。司马靳连坐而死，大约也是不肯做败军之将拒绝出征而被赐死的。司马错和白起从未打过败仗，具有唯物的求实精神和抗强梁的品德。这些思想和品德在子子孙孙口耳相传和身行言教之中形成遗传习性，这就是司马迁兵学思想的家学渊源。

第三，在司马迁的先人中，还出现了两位经济方面的人才，一是他的四世祖司马昌，在秦始皇时做过管铁矿的官；二是他的三世祖司马无泽，在汉代做过管理长安集市的市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现在有关司马昌和司马无泽的详况，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既然能在当时做经济官，那么他们自然具备管理经济的专门业务知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他们离司马迁都不算太远，在一个很重视家学渊源的家庭里，他的祖先从事经济工作的经验及知识，肯定会程度不同地被留传下来。司马迁熟悉各地的物产和市场行情，具有较好的经济头脑，尤其在当时那种朝野一致“重本抑末”、一致极端歧视与敌视工商业的时代里，司马迁能有那么杰出的有关工商业的观点，我们认为，

这和他从小得到的家教有关，在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时，似乎应该考虑到这一层因素。

司马迁的家世久远而简略，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生年未详。他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令的级别并不高，但司马谈很珍惜这一职务，把它视为自上古以来的世传祖业，并决心坚守这个世业。他经常用“世典周史”这一光荣家谱来教育司马迁，启发他肩负历史的使命，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历史家。为此，司马谈对司马迁从小就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在司马谈的督促和培育下，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等古代史籍，后又向今文学派人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古文学派人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至于司马迁的壮年漫游，也是司马谈为司马迁以后写史作准备的一次精心安排，和纯粹的游山玩水有本质的不同。

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是个真正的学问渊博、知识丰富的人。他的这些知识，可以说全部都传授给了司马迁，使司马迁成了融贯古今、兼通百科的大学者。司马谈对先秦诸子素有研究，写了著名的学术论文《论六家要旨》，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比较公正地评论了各家的优劣长短，而竭力肯定了道德家的学说。

《史记》中的许多评论常常流露出对黄老思想的推崇,就是受了乃父影响的结果。《论六家要旨》强调六家并存,认为它们都对治理天下有用,只是方法不同,不可一概废弃,表现了司马谈治学兼容并包的博大气象。司马迁撰写《史记》,包容百科知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得益于司马谈的方略教导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继《春秋》之后编纂一部新的历史,司马谈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搜集材料,拟订体例,还草成了一些篇章,最后临终前又遗命司马迁,鼓励他以孔子作《春秋》的精神,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心血的结晶,司马谈的遗嘱,成了司马迁著述的动力之一,《史记》的最终写成,也是司马迁完成父命、怀念父亲的一种表现。

(三)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夏阳是汉代的县名,县治在今陕西省韩城市西南。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也有说是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的,我们不取。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是在他的家乡夏阳度过的,那里有滔滔滚滚的黄河,有被大禹疏凿过的龙门山,其地势风光壮阔而神奇,从小给司马迁以精神气质上的陶冶。长大后,又实实在在地参加过耕种牧

畜的农业劳动。关于司马迁的耕读年代地点,学术界的意见不尽一致。最近吉春经过分析考证,认为“司马迁十九岁前是在夏阳龙门故乡耕读的”,我基本同意他的观点。《太史公自序》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王国维据此作《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九岁以前在家“耕读”,十岁“诵古文”就是跟着孔安国学占文典籍,那就只有住到京城里去了。学术界至今一般都取这个说法。但是“耕读”是司马迁生平中一件大事,能仅仅指九岁(实则八岁)以前的孩童吗?而且《报任安书》中又说:“少负不羁之行,长无乡曲之誉。”既然提到“乡曲之誉”的有无,那自然就需要他确实在乡曲住过,而且住的时候已经是“长”了,不然怎么能够要求乡曲对他的“长”作出评定呢?所以我们分析,司马迁在二十岁以前,大约基本上都是生活在当时西河那个文物之邦的故乡。在这期间,因为其父司马谈在京为太史令,所以也就不能排斥司马迁时而入京省父,或在京住上一个时期,学些什么东西。只有这样才合情合理,才可以说通前面的那些关键字眼。在二十岁前的这段时间里,司马迁除了跟着孔安国学过用古文字(大篆)写的先秦典籍,还跟着董仲舒学过用当时的文字(隶书)写的《公羊春秋》。二十岁以后,他离开家乡到各地考察游历,前后十几年间,周游的区域很广。向南他到过今湖南、浙江;向东到过今山东的曲阜,以及今安徽、河南的许多地